

从鲲鹏到五蠹——先秦道家与法家隐喻的叙事策略与思想建构

迪丽娜尔·地力夏提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830017)

摘要:本文以《庄子·逍遥游》与《韩非子·五蠹》文章为例,分析两者隐喻运用的差异以及其中蕴含的哲理。研究发现,庄子运用自然意向,如“鲲鹏”“神人”来表达精神的超越、无为的态度等意蕴,建立了以“逍遥”为核心的世界观;韩非子则通过社会现实意向,如“守株待兔”“五蠹之民”等来表达自己对空谈仁义、施行法制与集中权力的理念。二者采用不同的隐喻策略,隐喻出了道家与法家思想对人性与秩序的不同看法,也可以看出先秦思想“自然”与“制度”的对立关系。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方式,为考察古典文本中隐喻负载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新视角,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庄子、韩非子思想异同性的认知。

关键词:鲲鹏;五蠹;先秦;道家与法家;叙事策略;思想建构

1. 引言

先秦时期,庄子代表道家、韩非子代表法家,他们虽然属于两个不同的哲学流派,但其文章都是采用了特殊的修辞手段来构建逻辑论述结构。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仅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人们借助自身的具体经验来认知事物的一种方式。^[1]著名学者 Lakoff & Johnson (1980) 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认为:任何隐喻都可以被看作是由“源域”(Source Domain)向“目标域”(Target Domain)转移建构的一个意向性映射关系,“源域”是对具体事物的经验描述,“目标域”是抽象事物的概念象征。^[2]如庄子的“鲲鹏”与韩非子的“五蠹”是以具体的意向为“源域”,通过意向这一中介具体经验来认知“自由境界”与“社会危机”的抽象概念内涵“目标域”,从而实现作者对于人性、秩序与权力的认知建构。

隐喻不仅是古典哲学中的修辞性言说,更是思想和认知本身。本文借鉴 Lakoff 的理论视角,以庄子与韩非子隐喻的“源域——目标域”映射为切入口,在庄子与韩非子之间探寻不同的隐喻构建以及产生的认知差异,以解读两者对“人性本质”和“理想秩序”的观念态度。

2. 隐喻意象的差异:自然超越与社会批判

本研究之所以选取庄子的《逍遥游》与韩非子的《五蠹》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于二者分别代表了庄子与韩非子所秉持的不同思想流派主张,并且这两部作品当中都运用了大量的寓言。其中,《逍遥游》是以大鹏、蜩与学鸠来作隐喻,体现了庄子的“自然无为”与“逍遥”的理念;《五蠹》则以“五蠹”来隐喻,批判那些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强调了“以法治为本”的重要性,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2.1 庄子的自然意象与精神超越

庄子作品《逍遥游》利用“鲲鹏”“冥灵”“大椿”“神人”等宏大的意象作为载体来架构出一套自然化认知框架。例如文中:“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将身高、巨浪式的体态以及横渡沧海遨游天际的庞大“鹏鸟”为源域,喻作身心顺遂时人们的个人理想和理想人格的宏愿,为精神自由的超越性境界。这样,就运用到了人的飞翔主体经验,依靠身体“飞翔”到达某种目标地时的体验作为映射基础,将飞翔的运动空间(从北海到南冥)带给人的飞翔经验映射到一个人实现了“逍遥”达致某种目标后的自由的心里体验当中去。这里使用到的身体经验(源域)与精神世界追求(目标域)的类似性实现的方法,符合 Lakoff 提出的“体验相似性理论”(Experiential Similarity)。

文中另有“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其中源域为寿命极长的“大椿”,目标域为超越生死、消解时间焦虑的永恒性。

可与 Lakoff 提出的“具身隐喻”(Embodiment)相关联,认为人类通过身体经验理解抽象概念。庄子对“鲲鹏”“大椿”的描写正是“以身体经验为桥梁,将自然现象升华为哲学认知”。通过自然生命的“长周期”与人类“小年”对比(如“朝菌不知晦朔”),隐喻“小大之辩”的哲学命题,暗示世俗认知的狭隘性。

庄子通过对自然意象的隐喻,系统性解构社会规范与人为制度。如文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其中源域为所描述的自然现象,即动物的本能,鸟兽满足于基本生存需求,所映射的目标域为人性应回归自然本真,反对礼教对欲望的过度规训。以“动物自足性”否定社会礼法的必要性,构建“去社会化”的认知框架;“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其中源域为超脱世俗、不染尘埃的神人形象,具自然神秘性。所映射了理想人格应摒弃功利追求,达到“无功”“无名”境界的目标域。通过神人的“超验性”隐喻,批判儒家“圣人治国”的伦理框架,为“无为而治”提供认知基础。

2.2 韩非子的社会现实隐喻与制度批判

韩非子在《五蠹》中以社会现实案例与生物类比为隐喻载体,服务于法家制度权威的构建。如文中“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其中以农夫固守偶然经验的社会实践愚行为源域,通过“固守经验——失败”的因果解构(源域),映射儒者空谈先王之政、忽视“法与时移”的政治愚昧,对“因循旧法——亡国”的制度批判(目标域)。原文中“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此五者,邦之蠹也。”其中以“蛀虫—树木”的破坏关系为源域,类比“五蠹之民—国家”的因果关系,来映射儒侠等群体危害国家稳定的社会危害,此为源域,为“法治”取代“礼治”提供合法性。以上隐喻符合 Lakoff 提出的“结构性隐喻”(Structural Metaphor),即通过一个结构清晰的概念喻(蛀虫破坏树木)来理解另一个结构较为抽象的概念喻(五蠹之民危害国家)。

以韩非子借助隐喻的工具化策略来建构法家制度秩序的认知图景,在“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中用生活当中因陡峭而难以逾越的十仞高城,以及连跛脚母羊都容易攀爬放牧的千仞高山这些具体的社会现实为源域,来映射法律与行为主体之间制度秩序的严格性及普适性。再有如文中:“饥岁之春,幼弟不饱;穰岁之秋,疏客必食”,用的是源域为物质匮乏时资源分配与人性自私反应的因果关系,以此论证“人性趋利避害”需要通过奖惩制度来约束和限制。Lakoff 强调隐喻的“结构映射”(Structural Mapping),需要保持映射逻辑的一致性,如映射的过程中要保持源域

“因……所以”的基本逻辑结构不变。韩非子使用“守株待兔”

这则寓言把源域里因为过于经验主义而安于现状造就政治失败的道理映射到目标域里,体现了法家重视逻辑要求的特点。通过现实案例的批判性类比,隐喻建构制度权威的不可替代性,形成“工具化”认知框架。

3. 哲学逻辑的分野: 人性认知与秩序建构

韩非子与庄子的思想关系呈现出“同源异流”的特点。两者皆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指出韩非子“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表明韩非子的思想底蕴与庄子同出一源,即二者都源于黄老之学。然而,尽管二者在哲学渊源上有所关联,但其价值主张却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呈现出“水火不容”之势。^[3]庄子将“自然”推向精神超越维度,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不应该以牺牲个体来维护社会制度。韩非子则将其异化为制度建构工具,主张通过严格的法律和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由此二人的哲学主张出现分歧,最终导向两种不同的治理哲学。

3.1 庄子“自然无为”思想及其逍遥之境

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自然无为”的思想贯穿于他整个思想理论之中。庄子主张按自然规律办事,不要过多地加以人为地操办,希望能够达到一种自由自在、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通过对《逍遥游》这篇文章隐喻意义的分析可以发现庄子运用各类隐喻表达了他的“自然无为”的核心思想。

《逍遥游》通过运用一系列富有感染力的隐喻,展现了“自然无为”的真谛。如大鹏振翼直冲九天之上的身姿,那翅不过垂天之云尔,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者九万里,它凌空翱翔于广阔的空间,并非有所依凭,而是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所致,这正是“自然无为”的体现。由此可见,庄子笔下的大鹏不过是一只极富象征意味的存在:从形式上来看,它的样子已然摆脱凡世的生活羁绊;从内容上来说,则是背逆俗流、顺应自然、纵情任性的生命姿态本身。以这样的方式形神并举地塑造出这种意象来描述这种“自然无为”,寄寓了庄子向往自由和遵从自然规律的内心世界。

庄子还通过“小大之辩”(蜩鸠笑鹏、朝菌晦朔)进一步阐明了各种生命认知有限的一面。例如:蜩鸠笑鹏,朝菌不可知晦朔,蟋蟀不知春秋等这些拟人化的寓言,说明不同的生命由于自身特性有限,对事物的认知就会有所不同。蜩鸠因为自身的短小而不知道大鹏;朝菌因短暂的生命而看不见一个月的变化;蟋蟀因春夏之时的短小而不懂得整个季节的变化。

庄子借助这些隐喻,阐明了认知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倡导人应该突破自己的局限,用更大的眼界去看世界,所以才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观点。“乘天地之正”,就是说一个人应该挣脱一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回到自然里面去,做到跟自然一体,可见庄子隐喻式说理充满着自然的意象。^[4]庄子的隐喻有着近乎无限可能的调适空间,在这个象征世界中,庄子反对任何以牺牲个人来服从社会制度的象征主义。这也是与代表社会规训之思想的法家的“法治思想”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思想体系。

3.2 韩非子“法治为本”思想及其隐喻表达

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韩非子将“法治为本,术势并用”定为其主张的核心观点。他主张要用严格的法令制度来保障社会安定有序,并且要通过法令制度去制裁扰乱社会秩序的“五蠹”之徒——儒生、游侠、私剑客、纵横家以及重臣。韩非子认为,这些人物会破坏国家和社会的秩序。通过对《五蠹》这篇文章中隐喻的系统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是怎样运用这些隐喻来向人们阐释他的“以法治本”的观点的。

韩非子的隐喻策略指向现实生活,舍弃自然意象,聚焦于批判社会角色。这种策略首先能使论证更加充分有力,其次能让其所宣扬的内容更加切近生活,富有可操作性。如韩非子将

纵横家比作“言谈者”,将侠客比作“带剑者”,认为只有“耕战之士”才是富国强兵之人,这样的比喻非常清晰、直白,能够让读者明了其意。这样一种现实导向性的隐喻所折射出的就是法家对于制度权威至高无上的肯定。^[5]

韩非子在《五蠹》中,将“学者(儒生)、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者)、商工之民”并称为危害国家的“五蠹”(五种蛀虫),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指出,儒生们虽然口头上强调道德和礼仪,但在实际生活中却无法真正落实这些理念,空谈仁义,以《诗》《书》等典籍批评时政,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纵横家们虽以口舌之利游走于各国,但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外交策略谋取个人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无固定政治立场,这种行为不仅误导了君主,还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游侠和私剑客们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帮助弱者,但他们的行为是基于个人的恩怨和私利,而不是基于法律和正义,以武力解决争端,无视国家法律,这种行为不仅破坏了社会的秩序,还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患御者通过贿赂、投机等手段逃避战争,拒绝为国家承担兵役。削弱了军队战斗力,直接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从事商业、手工业者,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积累财富却不从事生产,从而破坏“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农民弃田从商,粮食匮乏。法家认为,国家强大的基础是农耕和军事,而“五蠹”均脱离这两大核心。

韩非子非常重视“耕战之士”,认为农业生产和军事战争都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耕战之士是直接推动这两大支柱的群体。其中“耕者”通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国家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财富,保障民生。同样,“战者”也需要用实际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保卫国家领土安全、抵御外敌入侵、扩张势力范围等,是国家生存的保障。这说明这两类人都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是国家政权稳固后的“有功之臣”,需要用适当的规章制度来对他们进行奖赏和惩罚。

韩非子的隐喻极富现实指向性、批判性。他通过这些隐喻,揭示了社会中的各种有害现象,强调了法律和制度的重要性。在韩非子看来唯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约束破坏秩序的行为,保证国家稳定的局面。其现实指向性的隐喻,表达了法家高度认同制度权威的观点。韩非子认为对于各种危害,唯有靠强制的法律制度来加以压制,才可以规范一些人避免做出破坏国家和社会秩序的行为。

4. 结语

通过对比《逍遥游》与《五蠹》可见,庄子用自然意象剥离世俗观念(如鲲鹏展翅冲破,北冥象征逃离礼法藩篱),韩非子则用现实讽刺制度权威(如蠹虫隐喻要求消灭人性杂质)。二者的隐喻选择体现的是其人性认知不同,深刻揭示了道家与法家在人性论上的根本对立,道家主张“天道自然”,法家讲求“人道有为”的哲学内核。这种“鲲鹏—五蠹”的隐喻张力,不仅揭示先秦思想中自然观与制度论的对抗,也为理解古典文本中隐喻的思想建构功能提供了新的认知路径。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李毅. 当代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 (03): 146-150.
- [3] 张英伟. 论《逍遥游》中的意象隐喻[J]. 文学教育(中), 2011, (11): 24-25.
- [4] 王婷, 吴琪. 跨流派传播:《韩非子》与《庄子》寓言的互文性研究[J]. 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 2023, (02): 100-107.
- [5] 董立柱. 韩非子《五蠹》中的法治思想[J]. 青少年法治教育, 2021, (07): 40-43.